编辑:顾遐 美编:刘玉容 校对:孙晓冬 组版:蒋培荣

举家长征铸丰碑

□陈汉忠

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87年前的10月19日,中国工农红军冲破数十万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,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,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。至此,举世瞩目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。

二十多万红军将士经过长征,到达陕北时,幸存3万余人。曾有人作过统计,漫漫长征路,平均不到70米,就有一名红军倒下。

在这条用红军战士鲜血和生命铺就的胜利之路上,有一个八口之家跟随红军长征,先后有四人长眠在雪山草地,他就是老红军、原南京军区空军第二政委李中权将军的家庭。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曾题词:“满门革命赤子,辉煌永留青史。”

李中权将军已经辞世,但当年听他讲述举家长征往事的情景恍如昨日。

人们常说,人老了往往念旧。将军也是如此。尽管在长征途中将军失去了父母兄妹,但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,将军无暇顾及个人和家庭的不幸。祖国和民族的解放事业激励着他跟着党、跟着队伍转战千里,直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。我采访他时,将军已九十高龄,儿孙满堂的喜悦并未冲淡他对长眠地下亲人的思念。每每提及往事,总是老泪纵横,泣不成声。

1934年春天,将军奉命调往川陕省,率所属巡视团开赴反击国民党对川陕苏区“六路围攻”前线,协助红军主力作战。在通江县北的茅峪镇上,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将军的视线内。呵,是母亲!他欣喜若狂地奔过去,一把抱住母亲。母亲明显瘦了,但双眼目光坚毅。将军询问家中的情况,母亲沉默了半晌,说:“你再也见不到爹了,他已牺牲了。”说完,潸然泪下。

将军的父亲李惠荣是一位坚强的赤卫队战士,那天中午,正在为红军筹集粮草的他巧遇往前方送信的红军通信员。没想到,红军通信员早已被敌人跟踪。发现敌情后,他一把摘下通信员的红星军帽戴在头上,毅然迎上敌人走了过去。敌人围上来,他用一把砍刀奋力与敌人拼杀,不幸壮烈牺牲。

父亲杀敌殉国的壮举深深震撼了将军的心,作为一名红军指挥员,他掂出了肩上担子的沉重。就要与母亲分别了,将军把干粮留给母亲。时隔不久,将军一家八口从不同地点,先后踏上了漫漫长征路。

第三次翻越大雪山、夹金山、虹桥山时,将军的心情格外沉重,他怀念长眠在雪山草地上的战友,怀念壮烈牺牲的父亲和被误杀的大哥李中泮,更思念不知在何方的母亲和弟妹们。

大雪山下的宝兴县城,是红军长征的必经之路。由于敌人的烧杀抢掠,小城已是残破不堪。就在这座小城的街头,将军竟然再度遇上了跟随主力红军部队长征的家人。母亲比上次见面时苍老了许多,刚过50岁,头上已有了许多白发,额头上深深的皱纹迭现出漂泊奔波生活的艰辛。“娘,你的身体……”将军不安地询问。“没事,娘能走,能跟着红军走下去!”母亲的坚定和执着令将军十分感动。

看见母亲身边的弟弟妹妹,将军不由得想起了二哥和另一个妹妹。经再三询问,弟弟才吐露真情。刚开始长征时,二哥一直跟着娘。后来,二哥参加红军上了前线。在攻克理番的战斗中,二哥和他的战友们迎着敌人的炮火冲锋,不幸中弹牺牲。说着,弟弟从内衣袋里摸出了拳头大的蓝布袋。将军知道,这是二嫂送给二哥的定情物。他颤抖着从弟弟手中接过蓝布袋,只见布袋上沾满了殷红的血迹。

“那中珍妹呢?听说她结婚了。”将军用手背抹了一下眼泪问弟弟。弟弟告诉他:“姐也参加了红军,姐夫石映昌是红军三十一军的一个连长,他们都在战斗中牺牲了。”将军抬起泪眼,眺望着远方的天空,再也没有说话。

1936年的5月,已任师政委的将军,在率领部队第三次过草地时,又一次遇见了阔别5个多月的母亲。

“妈妈!妈妈!”将军几乎是奔向母亲。半年不到,母亲已变得极度憔悴,她呆呆地望着将军,竟一句话也没有。将军紧紧地搂着母亲,心潮翻滚。作为红军指挥员,他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。可作为儿子,他又实在丢不下生他养他的母亲。前面是人迹罕至的大草原,身患重病的母亲能走得出去吗?“政委,要么我留下来照顾伯母。”警卫员看出了政委放心不下母亲,跑过来向他请示。还没等将军表态,一直没有说话的母亲突然开腔了:“不成,我们自己跟着队伍走!”语气里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。“妈儿,快走吧,别误了大事。”母亲的语言有些颤抖。将军想给母亲留下些吃的,可摸摸身上,盐巴、银圆都没有了。突然,不远处的战马长嘶两声,他心里一阵激动,“对!把马留下给母亲和弟妹,或许在母亲走不动时有点用处。”他疾步走过去,牵过马交给弟弟,他朝站立在草地上的母亲、弟弟、妹妹投去最后一眼,迈开大步,朝着北上的红军队伍追赶过去。

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村妇女,何以对红军、对革命有如此坚强的信念。这连当时的将军也没有好好思考。令将军没有想到的是,与母亲草地一别,竟成永诀。一个多月后,母亲在长征途中的东谷喇嘛寺倒下了。

母亲倒下了,但母亲对革命的信念一直激励着将军。在繁忙的工作之余,他撰写了《母亲万岁》的回忆录。他说,一个革命者,可以没有金钱,也可以没有官位,但绝不可以没有信念。

岁月物语

江海采风

“盼盼一代”的亚运会记忆

□陈奕尔

第19届亚运会在杭州开幕,各大新闻媒体不断从西子湖畔发来关于大会的消息,这让尘封了30多年的关于北京亚运会的记忆底片在头脑里渐渐清晰。

那是1990年9月,我刚告别小学时代,步入初中。小学同学中有不少人转到镇上的学校去了,作为一个祖上世代务农的农家娃,我别无选择地进入“双甸农中”,内心不免滋生出些许失落,但这种情绪很快被亚运会的热烈气氛冲散了。

学校以“喜迎亚运”为主题举办了一系列活动,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:一个活动是书画比赛。我涂鸦了一幅全家围坐电视机前收看亚运赛事的铅笔画,还有一只趴在地上凝神同看电视的猫,我把画作取名为《为亚运健儿喝彩》,不想被教美术的袁校长评为二等奖。还有一个活动是亚运主题歌曲合唱比赛,我们班唱的是《亚洲雄风》。班主任陈美云让我们站成亚运会会徽的造型,女生站成亚奥理事会会徽中的太阳光芒,男生站成雄伟的长城组成“A”字形,选了一位会双手画圈的美女做指挥,再请音乐老师葛宗奎辅导。我们的练习很投入,上学时大家抽课间时间练合唱,放学后各人练各人的。经过几天苦练,一首《亚洲雄风》被我们这群农家娃吼得地震山摇,颇具声势。直到今天,我还记得站在条凳上,在露天操场上挺起还不宽阔的胸膛,唱起“我们亚洲,山是高昂的头;我们亚洲,河像热血流 。”最后在比赛中一举夺魁,让初二、初三的学哥学姐们刮目相看。通过这次合唱比赛,我体会到昂首挺胸的感觉——一种意气风发的少年自信。

9月22日下午举办亚运会开幕式。我们全校在上了一课后都放假了。回家途中,村里人疑惑地望着我们,以为我们逃学归来,我们理直气壮地喊着:“看亚运会开幕式直播啰!”

那时,村子里有电视机的人家还不多,我家刚买了台17英寸的三元牌黑白电视机,来我家看开幕式的孩子还真不少。母亲炒了一锅新收的南瓜子和红皮花生,给小观众们分食。随着运动员进行曲的播放,讲解员的清晰讲解,电视机前的我们都比较亢奋。观看着37个代表团和6000多名运动员的入场式,我当时的感慨是,亚洲真的好大啊!

在随后进行的比赛期间,我画出了大部分国家的国旗,让大家一起记忆和辨认。我们真切感受到亚洲的广大辽阔,初步学会了以世界的眼光看待社会和人类。

课间,中国选手参赛获奖情况成了我们的焦点话题。他们拿了奖牌,我们也好像拿了奖牌。他们登上领奖台唱国歌,我们要么在广播前,要么在电视机前跟着附和。尤其在看到如皋选手周玲美以1分13秒899的优异成绩打破自行车一公里计时赛的世界纪录并夺冠,南通籍选手林莉取得4金1银的好成绩时,我们更是受到了极大的鼓舞。我们甚至相约骑着脚踏车去比赛,同学中有几只“水鸭子”,全然不顾渐凉的河水而下河游泳。我们享受到了运动的快乐和竞技的喜悦。

30多年前的那场体育盛会,无论是比赛规模,还是组织水平和比赛成绩,对所有中国人都是一次影响深远的鼓舞。上海世博会期间,网上有人把体验过世博会的青少年朋友称作“海宝一代”,那么我们可谓是“盼盼一代”。

北京亚运会,那场1949年后的第一场国际性的体育盛会,让我们这群农家娃涵养了全球的眼光,挺起了自信的胸膛,培养了合作的情怀。我永远感谢那场记忆犹新的体育盛会。

寻常巷陌

莲花开了 花心有光

□明前茶

菜场的农民自销摊位,一位大婶正在卖荷花花苞与一束一束的莲蓬。摊主很有个性,她的莲蓬只卖给买莲花的人,理由是:“要是光卖莲蓬,我带梗采摘做啥?这些都是老莲蓬了,不相信,你摇一摇莲蓬,莲子会在里头哗啦啦响。看到什么都想着吃,多没意思,这莲蓬是用来搭配莲叶与莲花,插瓶放在你们城里人的书房,观赏用的。”

摊主58岁,在城郊荷塘种了40年莲花了。从前,孩子们的凉鞋与暑假电影票,开学后要买的白球鞋和课外书,都靠卖莲蓬攒出来,十块钱5个或6个莲蓬,莲蓬尚且鲜绿,莲子刚刚撑满子房,就采下来卖给城里人当零嘴吃。莲蓬下面的荷梗要尽量剪短,减轻挑担时的压力。嫩的莲子是清甜的,长老了就有点儿发苦,所以当年,每到夏末,她心里都急得很,莲蓬高高低低,一个人来不及采,着急;不能在当天及时卖出去,莲子的吃口会变差,也着急。现在,她终于不急了——孩子们都已工作,日子过得不错,她种莲卖莲,就成了解闷儿的事了。

今天,她采下的莲蓬与荷花花苞一样,都带着长梗子。她交代我回家后,要将莲花花苞外层有点发紫的花瓣剥除,在花枝底端剪成约45度的斜切口,将水龙头开到最小,将花苞小心吹开一点,以水流徐徐地冲花心十秒钟,再将荷花花茎倒过来,在中空的花茎里灌满水,深水插瓶。这样,花就不会在开放的过程中东倒西歪,就能不蔓不枝地开足了。

卖个花,还要包开足啊。摊主认真回复:“跟别的花不一样,莲花就像我家的小闺女一样,非要看她漂漂亮亮出嫁,才安心。”

花买了回来,请出铜瓶,将花苞与莲蓬放置在光线明亮的通风环境中,以她赠送的莲叶插水陪衬。第二天,红莲就盛放了。它自带光亮,好像花朵中央有个天然的光源,在昏暗的阴雨天,它也微微发亮,把花瓣上流畅的脉络照得纤毫毕现。一朵花的一生只有三到四天,那么短暂,不过,要是在荷塘里,花谢了还会长出莲蓬,莲蓬不摘,莲子落在水塘深处,第二年还会亭亭出水,成为浩荡的风荷。哪怕池塘干涸,莲子没有发芽的机会,千年之后,有了合宜的气候,莲子照样会恢复生机,长出卷曲的莲叶。

如此柔弱的花,像世界上最安详的灯盏一样微微发亮,却孕育出如此坚韧的莲子,可说是奇迹。

欣赏 袁建摄

我的初中老师们

□梅九宏

初中读的是一所省重点中学,离家不远,在那个升学无压力的年代,我轻松地迈进了初中阶段。

初中老师形态各异,教法各具特色,但都很敬业,且对学生的教育更为宽松、柔和。几何老师讲课条理清楚,一脸严肃、话语平和、板书认真,有时为了画图示意,突然一只脚往前一跨,形成了弓箭步的造型,威风凛凛,姿势特别夸张。下课后,大家纷纷照着老师的模样,摆造型、学动作、仿声音,笑声不断。

历史老师长得像个老古董,长长的脸型、高鼻梁,宽大的眼镜框,外地口音很重。挺厚道的一个人,讲课慢条斯理,有同学打瞌睡,甚至交头接耳,他往往充耳不闻,自顾自地继续讲课。

初一英语老师比较年轻,个头不高,黝黑精干、不苟言笑,偶尔有的一丝笑容也是硬挤出来的。讲课时,他一本正经、一脸严肃。我们班大多数学生是零基础,看到英语字母,第一反应是汉语拼音的读法,课堂上时常闹笑话,老师很着急,经常批评是对牛弹琴。其实,我们更着急,往往在单词旁边用汉语标注,好歹能够读个大概,但是,朗读句子更加千奇百怪,声调降调混淆不清,老师气不打一处来。那天,老师正耐着性子领读“Are you a student?”突然,邻座手捂肚子,装出痛苦表情,阴阳怪气地来了一句“哎哟喂肚子疼”,弄得大家哄堂大笑,老师也是哭笑不得。

物理老师胖胖的,好像是工农兵大学生。圆圆的脸,非常和善,讲话不紧不慢,而且从前到后都是相同语速、同一语调,他对调皮捣蛋的同学批评最多的话就是“有的同学在无组织无纪律的轨道上越走越远……”希望他们早日悬崖勒马。考试前夕,他反复提醒“有的同学每次都临时抱佛脚,也到了应该抱的时候了”,意思是不能再贪玩了,赶紧心无旁骛复习迎考。

毕竟是省重点中学,老师非常注重我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。每周都有音乐课,在那时的我心目中,音乐课应该是老师踩着脚踏风琴,双手按键盘,发出美妙的旋律,然后教唱几首歌曲,反复教、反复唱,直到大部分同学能够完整唱出为止,轻轻松松,没有任何压力。而初中音乐老师非常专业且执着,胖胖的中年妇女,一看就知道能唱美声的那种。我五音不全,知道简谱123是哆来咪,虽然声调不太准,但好歹能读出音,可老师偏偏喜欢教五线谱,我在课堂上跟着老师依葫芦画瓢勉强能应付。平时滥竽充数也没人关注,最让我头痛的是期末考试,好在老师考虑到节省时间,经常安排双人唱,考试也允许自由组合,这倒是给了我可乘之机,我一般会抢先预定一个音乐基础好的同学同考,这样强弱联合、歌声融合,每次也都能侥幸蒙混过关。

相比较而言,体育课就没有那么好糊弄了。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但是体育成绩往往勉强过关,特别是男生须800米长跑达标,否则不能评上“三好生”。我耐力不行,虽然每次800米跑得气喘吁吁,甚至死去活来,还是功亏一篑,这成了我的心头之痛。

所幸体育老师通情达理,只要我们有空闲时间,随时请他来帮助测试。那天下午天气晴好,我觉得挺适宜跑步的,几位同学陪着我来到操场再次踏上达标之旅。我清楚地记得,我穿着一双大大的厚厚的黑布棉鞋,外婆手工纳的千层鞋底,总重量估计得1.5斤以上,脚步沉重地启程出发,在同学的加油鼓励声中,我终于艰难地跑完全程。在冲向终点的一刹那,几个同学一起盯着体育老师的秒表跳了起来,我就知道闯关成功了,老师也很开心。而我跑得汗流浃背,脸色苍白,几乎无法说话,两个同学架着我缓慢移动。布棉鞋浸透汗水,越发沉重,现在想来,那时为啥不穿运动鞋跑步,估计可能是家里买不起,也可能不知道好的运动装备有助于提高运动成绩,否则可能早过关了,因为每次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当然每学期都要过长跑关,年年难过年年过,每次也都侥幸过关,因此也顺利评上“三好生”。

班主任老师很人性化,担心同学长期在教室的同一个角度看黑板,容易造成视力问题,往往每隔一个月,会将全班座位整体顺位平移。班主任一般选在某个周末下午放学后宣布调整,话音未落教室旋即一阵骚动:搬课桌的、背书包的、拿课本的、收缴作业的,吆喝声、叫嚷声,课桌与水泥地面摩擦产生的刺耳声,瞬间交织在一起……在那个平日相对沉闷的教室里,大家非常渴望挪动座位,暂时混乱也是一种难得的宣泄,更是那个年代初中生少有的青春节拍。

学习紧张之余,同学们也有自己的娱乐。上世纪80年代,全国掀起了“特异功能热”,有气功治病的、有隔空取物的、有耳朵认字的,五花八门什么品种都有,我们班竟然也出了这样一个奇人。

那是一个个头小巧的女同学,有同学写了一个字,揉成一团,交给她放在耳朵里,过一会儿,她就能准确说出什么内容,屡试不爽。然后,愈演愈烈,每逢自习课大家便争着请“奇人”表演特异功能,我们都很崇拜。特别让我羡慕的是,如果我也拥有这个功能就好了,可以把一些不想背的内容先行抄写好放在耳朵里,这样考试不是很轻松吗?然而好景不长,不知怎么传到班主任耳朵里,他找该“奇人”到办公室谈话,旋即宣布是一场闹剧。虽说此事早已盖棺定论,我一直没搞得清,她是怎么能够绕开现场同学的视线偷看认字的?后来听说她的同桌是从犯,两人瞒天过海配合得天衣无缝,竟然没有被看出破绽。

学校的高中部也是当地最好的学校,当地有个说法:进了县中的门,就是大学的人。老师在班上说,学校规定,本校初中部的同学只需在初二、初三共4个学期连续被评为“三好”学生,就能免试直升高中部。那年好像是第一次规定,我们也从没有看到过文件,当然也轮不到学生看,权当戏言。

最终,我们班有三位同学光荣入选,我有幸名列其中,我们三个都是普通家庭、毫无背景。那个年代完全依规定、按标准、凭成绩执行,没有暗箱操作,好像也没有申报、公示的流程,家长可能连学校大门朝向都不知道,与老师几乎素未谋面,更不可能去找人活动了。

那是1984年的夏天,那个年代的人相对简单。

情感驿站

寿宴

□陈根生

说是家宴,其实是在饭店里举行的,20座的大圆桌齐齐整整坐着10对老夫老妻,从老大、老二、老三排下去直到老幺10个一个不缺。

今天的主题本来是庆贺老大生日,不知怎么开头就跑了题,跑到缅怀当年母亲的许多好:“妈妈说过,男娃也好,女娃也好,哪个不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?”“人家送个苹果自己舍不得吃总要留给孩子,宁可苦自己也不肯苦娃。”大家争相回忆母亲,说到动情处,有人泪光闪烁。

想不到头发花白的寿星佬主旨演说也跑了题:“本来我应该感谢兄弟姐妹专门为我操办这桌生日宴,但此刻我改变了主意,俗话说,‘我侬的生日,妈妈的难日。’农村人不习惯说‘夫妻二人’,总是说‘妻夫两个’,妻放在夫前面有道理,我们家老娘就是董事长兼总经理,当年要不是他们妻夫两个跟着商业下乡的政策安家落户大明乡,凭我们家一个街头小店十兄妹能不能全活到今天还是个问题,更别说欢聚一堂过生日。大河满了小河才有水,锅里没得碗里哪会有?”寿星佬是退休的乡村干部,难怪说起话来不打草稿也是头头是道。

于是20个人全都站起来恭恭敬敬把第一杯酒敬献给母亲大人的在天之灵。

10兄妹有3个在城里生活,7个在农村安家,大的80岁,小的60岁。大家有一个共识,父母在世时我们做到不让他们烦心,父母不在了我们也要做到不让乡亲们说他们坏话。所以十兄妹至今和睦相处,守望相助,平时各忙各的,一旦聚首却有说不完的话,彼此的新鲜事啊,下一代的学业成绩啊,再下一代的吃奶问题啊;男人有男人的难处,女人有女人的苦水;当年有当年的好汉英勇,今天有今天的酸甜苦辣;酒杯里都斟满浓浓的祝愿,吃到嘴里的菜肴仔细咀嚼依然有母亲的味道……

窗外紫燕呢喃,柳丝摇春。屋里亲情与酒香齐舞,笑声与佳肴合唱。

但这个美满家庭却有一点不完满,缺少一张全家福照片作为纪念。当年我曾提议趁两位老人健在,与10个子女合照一张全家福,齐齐整整,完完满满。可惜大家都不当一回事,转眼女主人突发脑出血,早上得病傍晚归西享年77岁,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风采永远地消失了,给这个原本的美满家庭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已经留下一个遗憾了,不能再来个后悔莫及,于是家宴最后有个全家福集体照项目。但今天生活在农村的几个老幺都反对,说什么大家正儿八经望着呆头呆脑传统照没意思,“视频”才与时俱进,说到做到,架起手机到了谁面前谁说句话,既有图像又有声音,于是一个个千篇一律,笑嘻嘻,挥挥手。转了一圈又一圈。一会视频玩玩还不过瘾,又有两个好汉跳将出来说:“玩抖音,抖音更时尚。”反正是手机的干活,于是一个前面吆喝,一个举起手机缓缓对准拍摄,俨然在拍电影似的,拍得稀里哗啦,笑得不亦乐乎。我一个老冬烘十分情愿十二分乐意被边缘化,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劲满腔热情地跟着傻乎乎地笑。热热闹闹总比遗憾强!把生日过出时代色彩总比单纯吃喝强!

但后来我还是耐不住寂寞发了个言,我说世界长寿吉尼斯纪录是西班牙一奶同胞12人齐全,但没提到12位配偶是否健在。比起来我们这一桌绝对也很自豪。一母所生10兄妹连同结发老伴一个不少,全都健在,快快乐乐。这可是现实版真正的中国式“人间喜剧”。

有人说,爱情会让生活更加甜蜜,亲情会让生活更加开心,友情会让生活更加愉快,乡情会让生活更加有趣。我以这家姑爷的身份全程参与全身心享受今天的生日宴,以我看,何必这么复杂,简单一句话,我们这桌家宴就是一根藤上结得累累挂挂的这四种蜜瓜!